

田在章墨跡

丁亥仲夏  
自詠  
  


-----  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田蘊章墨迹選 / 田蘊章書 — 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7.9

ISBN 978-7-80696-442-2

I . 田 … II . 田 … III . 漢字 — 書法 — 作品集 — 中國 — 現代 IV . J292.2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7) 第 123109 號  
-----

---

## 田 蘊 章 墨 迹 選

出 版 人 劉文君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和平區西康路 35 號 郵編 300051)

天津市建新彩印有限公司印製

全國新華書店發行

開 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12

印 張 11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數 1-2000

ISBN 978-7-80696-442-2

定 價：95 元

## 自序

「敏而好學，不耻下問」，這是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對成功者總結出來的一個定式。「敏」就是聰明，「好學」包涵着愛好和勤奮兩個內容，「不耻下問」則指謙虛。不過，由於受客觀條件的影響和制約以及聰明、好學和謙虛程度的不同，導致取得的成果也有很大的差異：有人取得了偉大的成就，有人僅取得一般或較好的成績。我，當然屬於後者。自我評價：說聰明，够不上，但自覺不是朽木；說勤奮，够不上，但自覺不是懶蟲。我所以能在書法方面取得些許成績，主要是憑藉着我對書法具有一種不明原因或者說是與生俱來的愛好，而最終未能取得驕人的成就，則是因為客觀環境所不允許，了解一下我的習書過程，便會給我一點同情和理解。

當年，我的祖父在河北省河間縣做過文書，能寫一手較好的歐體字，到了我父親和伯父這一輩，已將這一家風發揚光大，他們在書法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詣，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墨香濃郁的家庭中長大成人的。不過，很難使人置信，我最早愛上書法並非始於家庭。我出生在天津，未滿週歲時，便離開了父、伯、母親抱着我回到故鄉——河間縣河西村去侍奉我那多病的祖母。我在故鄉生活了六年，也就是說我在幼兒時期並

沒有接觸到書法，僅能記起的是我在三歲時就在村裏學堂旁聽。六歲時，我已能認識百餘字，其他生活記憶都已是支離破碎了，但唯有一件事至今記憶猶新。那是我四歲的時候，一天傍晚，母親要我到村東頭唐大伯家去打醬油，唐大伯名叫唐文釗，是位老秀才，破落時便以賣雜貨為生。在我買了醬油要走的時候，驀然發現唐大伯正在油燈下伏在桌上寫毛筆字，我好奇地走過去看他寫字，因為年小身矮，祇能踮着腳尖，扒着桌沿才能看見他寫的字。當時唐大伯正寫一個「地」字，一下子我被吸引住了，那個「地」字寫得太好看了，回憶那字形應該是柳體楷書。在我要回家時，唐大伯用手摸着我的頭說：「你爹寫得好，你爹比我寫得好。」從那天起，我就時常用石棍兒在磚牆上追摹那個「地」字，這一節生活片斷使我終生難忘，也是我走上書法之路的起點。

正式學習書法是在七歲的時候，那時我已回到天津，每天能看到父親與伯父寫毛筆字，每次都被吸引得一步也走不動。學習書法是我家族的頭等大事，我們大排行十個弟兄，不論愛好與否，都必須接受書法教育，伯父就是我們的導師。十兄弟中我排行老五，幾個哥哥對學書法興趣不濃，弟弟們尚年幼，當時祇

有我癡迷於此。伯父也很早發現我對書法有奇趣，便時常給些偏飯吃，因此，我在兄弟中書法成績一直領先。到十歲時，伯父已認定我是這個書法家族的接班人，於是納入正軌重點培養。最先是拿出天津歐書名家王竺鄰與陳景三的字帖要我臨摹，兩年後，伯父看我有了基礎，才拿出歐陽詢法帖《化度寺碑》要我系統臨摹，并規定日課五百楷字。當時我一邊看着法帖，一邊信心百倍地對父、伯說：「我一定要在十年內趕上歐陽詢！」祇聽得伯父淡淡地說了一聲『好』，便不再作聲，當我下意識地擡頭看父、伯時，發現他們正在相視而笑，那分明是對我的豪言壯語的一種嘲笑，我頓覺自尊心受到了傷害，從此，我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在十年內趕上歐陽詢，要在父、伯面前挽回自尊。爲此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，對《化度寺碑》從點畫到結構進行了精細的臨摹，此後又對歐陽詢的《九成宮》、《皇甫君》、《虞恭公》幾本中楷法帖進行了系統的對臨、通臨、背臨和意臨，堅持日課不少於五百字，每天不少於五小時練功時間。十五歲後，我又對歷代寫歐高手如文徵明、成親王、翁方綱、黃自元等名家墨迹進行了長時間的參照學習，同時我對二王、鍾紹京、趙孟頫和津門名家魏恩錫等前賢的楷書和行書進行了深入臨習，逐漸使我的楷書從板滯的碑刻中解脫出來。爲了排除工匠之氣，父、伯教我認真讀書，重點放在古文和詩詞方面。總之，我吃了很多苦，當年我家族老少三代二十二口，全部依賴父、伯二人掙錢餬口，生活窘困，無錢買紙練字，我便經常帶着九弟到街上撿紙回家練字。說到九弟，他是我唯一的同胞兄弟，當初因爲他年紀小，父、伯尚未對他傾注心血，更多的時候是我帶他練字，九弟在三、四歲時就與我搶毛筆，搶字帖，對寫字亦有奇趣，他，就是後來的國務院書寫員田英章。父、伯把僅有的一點積蓄幾乎全部用來購買法帖和名家墨迹，我像個尾巴一樣跟隨他們出入在字畫鬼市。記得我上小學五年級時，臘月的一個清晨，約五點鐘左右，天下着小雪，我又隨伯父到鬼市購買字畫，伯父從一個地攤上拿起一副對聯，剛打開上聯露出第一個『且』字的時候，我便大聲說：『這是華世奎寫的』，攤主大笑起來說：『不錯，正是華世奎寫的，這麼小的孩子有點眼力啊！』說着話跑到旁邊的一個早點鋪買來了一塊蘸滿白糖的切糕送給我吃。最終伯父買下了那副對聯，聯語是『且憑藤輪敲柳瘦，誰收竹粉拾松釵』。

回家後，伯父還獎勵我一個肉餃子，這使我學習書法更有精神。

在我終日伏案臨池的那十年中，正是書法界萬籟無聲的年代，幾乎見不到一個與我同齡的孩子學習書法，祇有極少數的老先生們還在悄然無聲地拿着毛筆寫字。那時學書法的人，祇有愛好的使然，絕無名利的驅動。我十八歲那年，父親帶我重返故里，又見到了那位已年逾古稀的唐文釗大伯，老兄弟重逢，自然話及書道，唐大伯對父親說了這樣兩句話，給我留下深刻記憶：「咱們可得好好活着，一旦死了就摸不着寫字了。」這是多麼感人肺腑的語言，道出了老先生們視書法如生命的那種最純潔的愛。

二十歲的時候我已經小有書名了，索字者漸漸多了起來，在親友、同學、同事中，聽到的都是讚譽之聲，於是我有些飄飄然，祇有拿起歐陽詢法帖時，纔使我冷靜下來，感到當初發出的「十年趕上歐陽詢」的豪言壯語實在是自不量力了，於是又一次暗下決心：「再花十年時間一定要趕上歐陽詢。」正當我躊躇滿志時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爆發了，在橫掃「四舊」的運動中，我家珍藏的大批碑帖字畫被付之一炬，十年如一日的臨池常規忽然中斷了，父、伯怕引火燒身，也

不再催促我練字，唯一練字的機會，祇有抄寫大字報。每當我抄寫的大字報張貼在街頭時，總會引來衆多的圍觀者，人們的注意力並不在文義內容方面，主要是對我的字評頭品足，津津樂道，長達數小時觀者不散，於是引發我一番感慨：「當中國人失去學習和欣賞書法的權利時，竟用抄看大字報來過一把書法癮，這是多麼可憐而又可愛呀！」是的，這就是炎黃子孫。其實抄寫大字報是不可能提高書法水平的，祇是過過癮而已，除此之外，我還利用「批林批孔」運動學點孔孟，利用讀郭沫若的《李白與杜甫》學點詩詞，因當時大部分古典文學著作都被封禁，祇有採用這種間接方式才能接觸到古典文學。久之，我也漸漸地失去了信心，經常數月間不寫字，不讀書，興奮點轉移到中國象棋，終日沉溺於對弈。

1970年，我所在的文藝團體被強令解散，我也被迫轉業到集體所有制的工廠去「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」，那時我僅二十五歲，正是人生學習的黃金季節，却終日接受着一羣目不識丁的工人老大媽的「再教育」，這是我平生最困難的一個階段，且時間長達十五年之久。此間我已是萬念俱灰，所有技藝全無施展之地，如：彈、拉、說、唱、寫作和書法都成了多餘的

東西，「一定要趕上歐陽詢」的信念成了一件不願回憶而又無法忘記的事，愁悶時隨便寫幾張行草字作為消遣而已，偶爾寫一篇楷書則隱約感到心痛。代之而來，「不可一日無此君」的樂趣，早已從書法轉入象棋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直到一九七六年「文革」過去，書法水平依然停在十年前的狀況，祇是隨着年齡和閱歷的增長，在行草書方面稍見成熟一些。

「文革」剛過去，大陸書法便悄然復蘇，到一九七八年已經熱了起來，我也好像一下子從噩夢中醒來，本已萬念俱灰，忽然又死灰復燃，於是開始了第二度的衝擊書法。首先在書店裏買來大批的碑帖和古典文學著作，把僅有的一點業餘時間都拿來讀書寫字，此時又不時出現了許多美妙的幻想和憧憬。然而，時過境遷，我的學習環境比起十年前要困難了許多，父、伯年事已高，且分居三處，再不能經常的口傳心授，耳提面命。我每月工資不足四十三元，祇得戒了烟酒，戒了早飯，把僅有一點節餘用來購置學習用品，而學習時間又祇能擠在八小時以外，况四口之家僅有不足十平方米的住房，經常是等待家人熟睡之後才能學習。更大的困難還是來自單位，「文革」雖然過去，我的工作處境却絲毫沒有改變，甚至更加惡劣，儘管

我千方百計地想逃離這個像牢獄一樣的集體所有制的小工廠，但體制問題像鐵箍一樣緊緊勒住我的頭和腳，死活掙不脫。又由於我在工作上的心猿意馬，時常激怒廠領導，在我偷用上班時間練字時，多次被廠領導當場抓獲，之後，便在大會小會上點名批判，給我精神上造成極大的痛苦。禍不單行，家庭又出現了危機，隨時都有解體的可能，內外交困，逐漸我的精神到了崩潰的邊緣，身體也隨之垮了下來，腸胃植物神經紊亂，導致經常性的嘔吐腹瀉，面黃肌瘦，體重銳減。長期求醫無效，遂懷疑自己患了不治之症，雖然每天還在堅持學習，但已對前途失去信心，『七律·秋夜悲歡』就是這段時間寫出來的：『蕭蕭秋雨最傷神，淚滴枯毫紙半湮……徘徊落葉林間路，珍重飄紅劫後身。』楹聯：『孤芳僻境愁三伏，怨鬼荒墳哭四更。』可以看出我當時極度破敗的心境。唯一能寬慰自己的，祇有書法，她像一盞未燼的殘燈，還在昏暗的心房中不停地閃爍。我在詩中寫到：『潦倒不忘風月事，一床碑帖盡佳人』，可知在最困難時期，書法是我最眷戀的『親人』。

一九八〇年以後，隨着書法的全面復蘇和不斷昇溫，我的工作與生活的處境也有了改善，原因是我經常利

用業餘時間參加社會書法活動，諸如參加書法展覽、書學研討，以及擔任社會辦學中的書法教師，偶爾還能賣出幾張字，並逐漸引起了新聞媒體的關注和報道，於是有了點名氣，經濟收入也明顯增加，精神和身體也都恢復了許多，更重要的是我從一九七六年再度衝擊書法的十年中，書法水平有了較大的進步，不僅得到書界同道的認可，而且父、伯也時常拿着我的字不住地點頭微笑，說是「確有進步，需戒驕戒躁，再接再勵」。這時我已接近不惑之年，雖然在諸多事務中我仍是懵懵懂懂，而唯有在書法方面我確實解除了一个困惑，或者說是解開了一個死疙瘩，那就是對自己少年時發出的那句「一定要在十年內趕上歐陽詢」的狂言的放棄，三十年過來了，面對歐陽詢這座大山，非但沒有越來越接近它，反而感到越來越遙遠，頗有一「望山跑死馬」的感受。四十歲後，我才得出這樣的結論：「欲要趕上歐陽詢，今生已不能，來生亦不易。」當然每個人都有過少年的無知與狂妄，非但無須自責，反而覺得既可愛又可笑。

然而，書法形勢的發展，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樂觀，書法熱潮的負面作用却大於它的正面效應。自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以來，一大批大字報起家和背景特

殊的「新潮書法家」，帶着「文革」的滿身餘毒闖進了書法界，一時間「書法創新」的口號聲與「造反有理」的口號聲一樣的震耳欲聾，「新潮派」繼續以「敢字當頭」、「破字當先」的「大無畏精神」來改革書法，他們視古聖前賢如仇寇，把臨帖起家的書法前輩們統統視為「書奴」、「保守派」。他們利用天時、地利之便很快搶佔了許多書法組織的領導權和新聞媒體的制空權，總之，他們搶佔了所有制高點，把大量的醜書惡札和歪理邪說塞滿了各種報刊雜誌，還引進了許多洋破爛兒來充當新貨，於是一大批牛馬雜交的畸形「書法」應運而生，可悲的是一些基礎較好的書界青年新秀也都跟風而下，成了無辜的犧牲品。書法界一時變成了爭奇鬥怪的雜耍場，復活不久的書法又被引入歧途。誠然，中洋文化相遇，某些方面可以相融、互補，但某些方面則是衝突的、排斥的。而祇有這種互相排斥，才能互相生存。可惜我們的年青一代僅僅看到國家在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落後，便對我們偉大的民族文化也喪失了信心，書法本是西方美學的盲區，他們也強要削中國書法之足以適西方美學之履，這既是書法的悲哀，也是民族文化的悲哀。然而，面對這種令人痛心疾首的現實，我們却顯得束手

無策。我的《虞美人·觀書展》中「人生無欲則無愁，任爾一江春水向西流」的詞句，便是面對每况愈下的書法現狀發出的一種「無可奈何花落去」的哀鳴。

1985年，得遇貴人相助，也是時局的使然，我終於逃出了集體所有制的小工廠，轉到中國北方曲校，在那裏我當了八年講師，雖然也能盡職盡責較好地完成了本職工作，但書法仍然是我壓倒一切的工作中心。在這段時期，由於書法成績不斷帶來的實惠，我的名利欲望也大大地膨脹起來。1987年加入中國書協，1988年被選為天津書協理事和評委，1989年出訪日本、臺灣和香港，幾年間連續獲得國內外大型書展的一等獎和特等獎，數十家中外報刊、雜誌、電視臺連續報道，並每每以「津門歐楷第一人」為題大加讚譽，榮譽、鈔票紛至沓來，遂使我忘乎所以，把臨帖、讀書都擋置起來，每天車輪滚滚，祇為名利奔走。雖然父、伯時常以「寵為下」、「時無英雄」，即使豎子成名」的甘苦之言對我進行警示和批評，但我已經刹不住車了。我經常書寫的「澹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之類的警句格言，都是給別人寫給別人看的，與自己並不相干，甚至有一段時間自己也閉門造車，嘗試創立「新體」以追逐時尚。記得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書家叫王堅白的老先生告誡我：「楷書寫到這個樣子不容易，不要糟踐自己。」那時我

雖然領受到老先生的善意，也滿口接受着他的批評，但心底也有些懷疑老先生們或許守舊。直到1990年，父、伯相繼病倒，已口不能言，但每當看到我的「新作」時，都在不住的搖頭，此時我方感愧疚。而我真正幡然悔悟的時間，是在1993年調入南開大學以後，在這裏我經常接觸到文、史學界的一些重量級人物和極佳的學術氛圍，從而促使我加倍努力地讀書，通過讀書使我更加熱愛書法，熱愛古聖前賢，熱愛民族文化。隨着書法教學的需要，我把學習重點轉向了書學理論的研究，當然臨池日課也不敢稍事懈怠。重要的是在不斷的深入學習中逐漸克服了長期自負的心理，真正認識到自己與前賢相比還是一個不及格的學生。我的《如夢令》道出了這種真實的感情：「癡讀不聞風雨，嗜墨安知朝暮，何必問前程，一事無成虛度，尋路，尋路，人在書林深處。」記不清是哪位哲人講過這樣一段話：一個沒有知識的人，從不感到惶恐和苦惱，而一當有了些知識以後，就如同墮入了知識的汪洋大海，並且永遠不能到達彼岸，這時他才感到惶恐和苦惱（大意如此）。我進入南開大學工作以後，也有像墮入知識海洋一樣的惶恐。但我沒有苦惱，相反，更加激勵我學習奮進。雖是如此，可身在高等學府，怎能不考慮職稱與待遇問題，而大學裏並不看中你的社會虛職以及參加過多少次展覽，獲取過多少獎

項等一些社會活動，重點是以文字發行和教學成果作為衡量教師業績的標準，於是纔有了《九成宮醴泉銘探源》、《歐楷解析》等書的問世，包括電視書法講座《歐楷臨池》、《楷行草書法作品講析與演示》的完成，這一切都是為了解決職稱問題所做的努力。至於近期在北方網錄製的百集書法講座《每日一題·每日一字》則是出於另一種動機，它是對書界新權貴的一次挑戰，是我對醜書惡札橫行的一次大批判，是我對書協體制亟待改革的長篇建議書，是我為了端正書風做的一次最大限度的努力，是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一次鐵屋內的呐喊。如今這個講座在網上引起了一陣陣口水滿天的激烈爭論，正是我預期的效果。

最後，還要說一說出版這本集子的緣由。當今書家為自己出集子，辦書展，建藝術館（紀念館），僱人寫吹捧文章，拉攏官、商大肆炒作等等，已是司空見慣的事，然而，這却是為古代書家所不齒的事，對此，我也始終持以反對態度，矛盾的是我也做了不少這樣的事，諸如出集子、辦書展早已不是首次，雖然尚未僱人寫吹捧文章，但有人主動寫了，我也是暗自欣慰，由此可見，我批評別人經營炒作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。也曾自我解嘲：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」。

事實雖是如此，但我仍然自信有點良知，譬如，在我的書籍前，一般不求人作序，而多是自己動手，那是

因為我害怕別人肉麻地吹捧自己。我也曾辦過多次個人書法展，但在自寫的前言中總是說明辦展的初衷是一「為了大範圍地徵求意見，是學書進度的匯報」。最近有社會名流提出要為我捐款建立書院，我表示感謝的同時直言拒絕以我的名字命名書院。說到這本集子，也是在校領導一再鼓勵下，希望我能在境內外多辦幾次書展，如此，對學校對自己都會有好的影響。

既然辦展，自然要有作品集的配合，於是纔有了這本《田蘊章墨迹選》的出籠，及至自題書名時，我還是祇題「墨迹」不敢妄稱「書法」。當然無論怎樣表白，同道心明眼亮，總不會相信我是個名利之外的人，而我自己也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徹底擺脫名缰利索的人，但我還是要說：「一切都是個『一度』的問題」。

經過了半個多世紀漫長而曲折的攻書歷程，我必須承認自己終歸是個學而未成者，因此，時常感到有愧於前賢，有負於家教。但是處在這浮躁而虛妄書風日下的時代，我能敬畏書道，敬畏民族文化，堅持正統，不為潮流所動，又自覺無愧於當世。

是為序

公元二〇〇七年七月蘊章于蟠逸齋



田蘊章，字存文，蟠逸

齋主人。祖籍河北河間，1945年生於天津。現為南開大學教授、書法研究生導師、天津市政協委員。幼秉庭訓，始攻歐書，長於楷法，兼精行草。且博通吟咏，雅好琴棋。近年致力於書學研究。有《九成宮醴泉銘探源》、《歐楷解析》、《楷書抱沖齋七絕百首》等著作問世，並於天津電視臺錄製80集書法講座，於北方網錄製「每日一題·每日一字」200集書法講座，在書界引起震動。被譽為「津門歐楷第一人」、「當代正統派書家的領軍人物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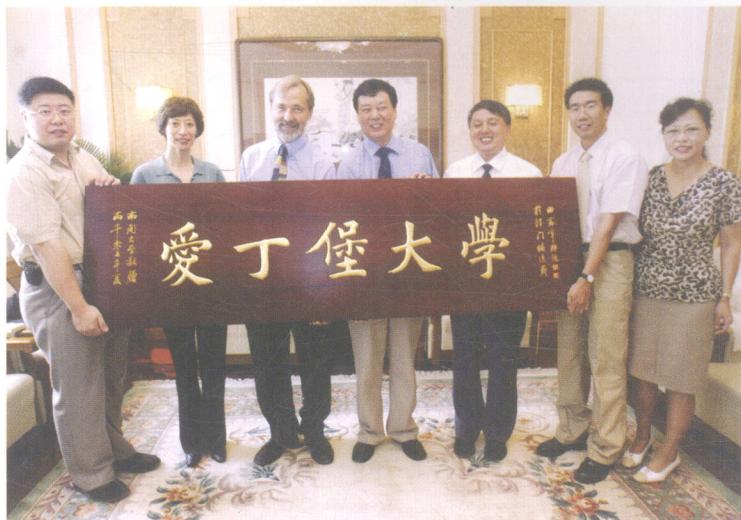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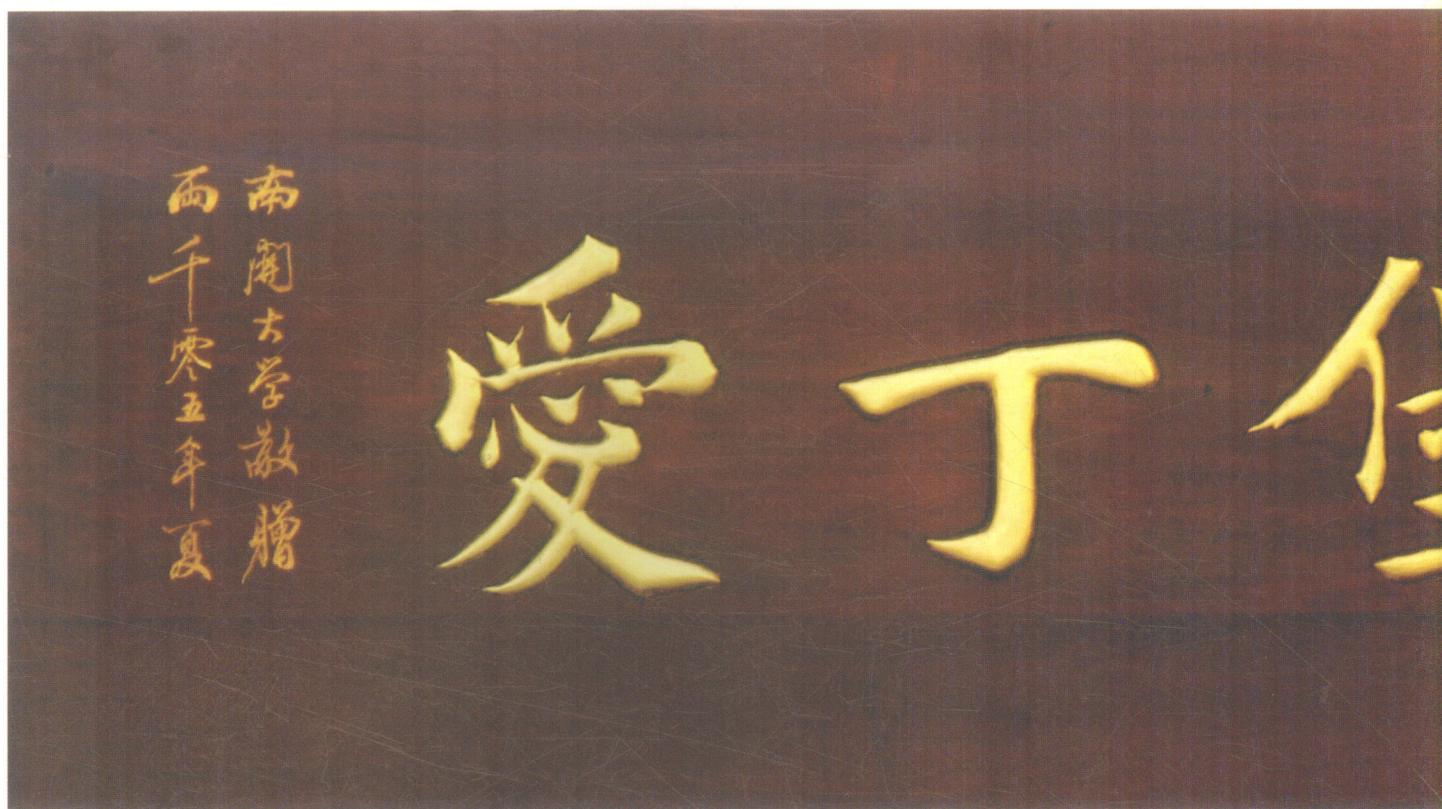
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  
精神汲汲駿駿月異日新發煌我  
峯途無垠羨哉大仁智勇真純以  
鑄以陶文質彬彬渤海之濱白河  
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

敬錄南開大學校歌一百零秋於渤海之濱存文田莊亨



二零零五年，英國愛丁堡大學請田蘊章教授為該校書寫校匾。圖為校匾原作，時任南開大學校長侯自新教授與愛丁堡大學副校長 Geoffrey Boulton 教授在南開校園舉行授受儀式。





圖為已刻製完成的愛丁堡大學校匾，時任南開大學校長侯自新教授與愛丁堡大學副校長Geoffrey Boulton教授在南開校園舉行授受儀式。

西千零六元

齊修

治

平

莊子開錄



大書文字堤防孝

剩買峰巒準備開

存文田苗章